

纸上的还乡

——“80后”诗歌的知识与技艺

周俊锋

内容提要 知识与技艺融汇的同时存有裂隙，“80后”诗歌彰显繁复的诗艺变形与艺术张力，拓展了现代汉语既有的诗意表达与结构功能，而写作首先亟需回应的是书写自身面临的窘迫。当代诗歌着意与同时代人的知识经验展开对话，尝试构建一种区别于日常语言的“可能性的语言”，现实困厄、写作焦虑、语言危机的背后内在指涉的是文学语言的智性与潜能。书写是对源头的迷恋，语言还乡的旅程联结着作家所向往的生活意义的源头；随着技艺的膨胀，那些关于“故乡”的记忆却黯然消褪，诗人对语言和存在的省视逐渐替代了传统意义上乡土回溯式的写作。“纸上的还乡”呈露的是当代诗人的日常书写与对话方式，探询更为有效的处理当代驳杂的社会知识与私人经验的可能。

关键词 “80后”诗歌；语言；还乡；技艺

《诗潮》杂志2002年设立“80后诗歌大展”栏目，《诗选刊》随后推出“80年代出生的诗人作品选”专号，辛酉与胡桑等主编《辋川》诗刊“80后”诗选专号，《诗歌杂志》曾以“80后”为主题集中展示青年诗歌，“千高原诗系”“中国80后诗系”“星丛诗系”等诗歌丛书与选本将“80后诗人群”的创作实绩集体推向前台。尽管如此，仍有许多优秀的“80后”诗人与诗歌文本未能进入有效的阅读传播及批评研究的视野。新世纪以来自媒体及网络诗歌的发展给“80后”诗歌带来崭新的机遇。《诗刊》通过“校园”“E首诗”“中国诗歌网诗选”等版块推介青年诗人的作品，《星星·诗歌原创》设置固定栏目“星青年”，《诗建设》于2016年冬季号推出“80后诗选”专辑，2013年出版的《中国新诗百年大典》关注并收纳多位“80后”诗人诗作，此外以《80后诗典》《80后朦胧诗选》为代表的网络诗选与诗歌民刊的活跃度与日俱增。“80后”诗歌的议题逐渐衍进为一种动态的文学拼图，直接指向我们当下所处的文学语境和思想环境；换言之，“80后”诗人与诗歌经过又一个

二十年的沉淀与积累，他们最初想要达成的诗学目标与当下能够抵近的实际影响，二者间已然生成某种实存的裂隙（抑或也有某种惊喜）。当我们在谈论“80后”诗歌时，诗群或概念的界定必然牵涉到诗学话语的整体性表述，而在这背后更值得关切的其实是观看方式问题，即我们以何种审视的眼光来重新进入“80后”诗歌，并以此审慎而积极地展开一种更为有效的、可供对话的批评与研究。

对“80后”诗歌的讨论，我们应警惕两种潜在的风险：一是如燕卜苏所言，我们相对缺乏某种稳健可靠的分析手段，从而使诗歌读解丢失掉一种有普遍说服力的信念，难于梳理和归纳“80后”诗歌生态的复杂面向，相反我们却热衷于建立某种整体视野的论断或认知；二是我们口中所言说的“80后”诗歌因为出发点的不同而必然各有侧重，最终造成意旨的滑脱或流于浮泛——那么在众多的声音里，我们各自所指称的“80后诗歌”实则可能并非同一种言述对象或问题。技艺与价值二者之间的固有界限常常被轻易地混淆，我们急于厘清或根治“80后”诗歌成长过程中遭

遇的病症和疾患，而对正在处于生成和变动中的汉语诗歌传统缺乏足够的耐心来滋养，文本的考察与细读因此成为我们讨论“80后”诗歌的重要基础。对于辛酉、阿斐、胡桑、肖水、王东东、茱萸、杨庆祥、戴潍娜、徐钺、王璞、赵目珍、春树、唐不遇、郑小琼、王单单、须弥、徐萧、严彬、叶美、李成恩、李浩、江汀、黍不语、黎衡、谈骁、熊焱、吴小虫、张二棍等“80后”诗人，在有限的文章篇幅里无法细致讨论；我们或可从某种裂隙或惊喜中探询文字背后的真诚，即当代汉语诗歌的语言自觉与诗性潜能。

返观现代汉语诗歌的发展历程，“代际超越与被超越、影响与反影响的格局”^[1]已然渗透并持续生成着新的传统，我们应着意关注“80后”诗歌切入时代经验与个体生存的特殊方式。“80后”诗人群对时间或记忆、童年或故乡、旅行或日常的重复书写，指向一种语言本位或元诗向度上的写作焦虑，以及个体现实生存层面遭遇的精神困厄。语言的存在之家，成为个体自身始终无法藉由书写而真正抵近的原乡想象；物本身的阴沉乃至语言自身的幽闭，与时代以及写作个体自身的思想自由度密切相关。我们或可从一代人的青春写作中提炼出穆旦所说“发现底惊异”，却难以据此来真正接近物或语言的内核、难以从普遍意义上洞察语言或书写的终极奥义。“80后”诗歌的创造性写作，正在使用语言的精湛手艺来检视主体自身，小心翼翼地清理着书写者脊背上可能的污点，以求恢复和激活写作个体“原初生动的感受力”^[2]。我们以参差不同的禀赋和不甚可靠的观看方式来试图接近诗人的冥想与劳作，理论批评的写作不啻为一种抒情的冒险或游历，以下对“80后”诗歌的观察，从汉语性、主体性、可能性、代际性四个方面来展开。

一 汉语性的范畴

诗歌对自身言说方式与言说能力的省视，最终导向对语言与存在之家的回溯，关乎从精神向度对母语以及汉语性等范畴的一种自我觉识。海德格尔曾说：“诗人的天职是返乡，惟通过返乡，故乡才作为达乎本源的切近国度而得到准备。”^[3]对

书写的本源进行执著探询，对诗歌语言与存在之间的内在关联进行叩问，以诗歌来反思诗歌自身成为当代汉语诗歌的某种共识。于坚指称汉语本然具备神性的力量，应把日常生活进一步神圣化，“通过对他们的命名，通过汉字本身的力量，让他们具有神性”^[4]；张执浩则将日常生活的审美取向推向一种心灵家园的建造，“她必须依赖一个又一个结实的词语来砌筑，她要求这些词语必须严丝合缝，形成强大的精神咬合力，惟有如此，这家园才能遮风避雨，才能发出游子回家的呼唤”^[5]。返观上述“还乡”的路径，书写的命名或表达的完满仍然只是某种浅表意义上的抵达，而言述行为的完成并不充分意味着诗歌和语言已经走向还乡旅途或精神辨识的终点。臧棣对戈麦及其同时代的诗人创作进行辨析，“一个用汉语写作的年轻诗人，他的语言的悲剧在于他只能凭自己的语言个性来应对砸向他的压力，他没有伟大的典范可供依循”^[6]，指出汉语性的深化与发掘更多地倚赖于诗人自身的创造力，以及对汉语诗歌语言丰富可能性的试验和拓展。臧棣指称的“无焦虑写作”以及对诗歌创造性的信仰，在余飏看来必然要经受变动的历史语境所带来的消解和质疑，最终“将会丧失与历史间具备的辩驳张力，对‘可能性’的追求反会变成常识性的表达”^[7]。而张枣则重视汉语自身的“甜”与“美”，“它更深的成熟应该跟那些说不出的事物联系起来，这才会使汉语成为一门真正的文化帝国的语言”^[8]，但是这一持续性的反思留给当代汉语诗歌具体操作的现实空间实际上却并不开阔或敞亮，仍然检验着数代诗歌创作者卓越的个人才能以及根植于整个历史文化与知识传统的言说能力。在此意义上，讨论“80后”诗歌语言与抒情方式的衍变，能够帮助我们更加清晰地认识或接近“80后”诗歌的汉语特质。以下试从辛酉的诗歌《郊外的稻子割了》谈起：

在远处更远//是一些诗意的炊烟，踩着/
村庄的肩膀，慢慢地/慢慢地爬上天堂。然而
//然而真正让我揪心的是/那些稀稀落落的稻
茬，以及/那些显然是，由于//长久干渴而无
限开裂的稻田/那一刻，父亲的愁容/在我眼
前突然一闪而过^[9]

从日常逻辑来看,庄稼的丰收和稻子的收割的确意味着某项事业的“完成”,然而以诗性逻辑来观照不难发现,完成时态的“稻茬”却呈现出另一番风景——“长久干渴而无限开裂的稻田”。诗歌语言与眼前稻茬的“平仄不一”实际上巧妙地构成一种语义的双关,稻茬的“稀稀落落”联结着个体对生命自身的省视,稻子从一开始的生长状态就是持续式的、受难式的长久干渴。换言之,诗歌的最终收割与完成以及语言自身的生长成熟,恰恰印证了“诗意的炊烟”由村庄的肩膀袅娜向上的一种精神姿态,充满着看似轻盈实则艰辛的攀缘与求索,而这成熟之路必然要历经的磨砺是所有“父亲”脸上难言的愁容。从技艺层面来说,诗歌经由典型意象与诗意结构的塑造,从而使私我经验与那些说不出的事物关联起来,传递出一种普遍意义上的精神觉识。在“80后”诗歌创作中能够发现,暮野炊烟、村庄田园、幼年经验所营构或维系的乡土经验书写已经逐渐地被抽离,故乡不再是一种单纯的地理或心理意义上的“故乡”,更多呈露的是一种省视与回望的观看方式,在选择性怀旧与自我认同的追寻过程中导向对语言与存在之家的回溯,一种对书写意义和源头的追问。

刘化童的诗歌《在语言的墓碑上》同样表达出对诗歌与语言自身的省思,“在语言的墓碑前,哑巴齐声高唱/故乡,你的指甲在我的唇上/刻下血红的宣布死亡的印章”^[10],女人、婴孩、男高音、守墓人共同出演的这幕哑剧,显露出时代语境对语言自身言说能力的禁锢,在语言的墓碑上留下的是“另一种语言”的嘲笑。诗歌的语言在生长的同时也逐渐走向删刈与湮灭,语言有着尖锐的指甲和沉默的暴力,对故乡的回溯与追忆伴随着语言的死亡而陷入绝境。但是这一省视诗歌语言与存在自身的朝向却始终潜行突进着,“作诗就是追忆,追忆就是创建。诗人创建着的栖居为大地之子的诗意栖居指引并且奉献基础”^[11]。“80后”诗歌对诗歌语言及汉语性的思考是一个持续深化的过程,联结着对主体性认知和个人化历史想象力的延伸与拓展,以期构建属于“80后”诗人自己的、与历史时代或自身展开深层对话的有效形式。对比徐萧的两首诗歌《重调〈与水书〉》以及《白云工厂》,虽有人

称代词“你”与“我”的转变,却共同指向对主体自身的追寻,由“我”所描述的祖辈们、沸腾的田野、疯癫的外婆,无数个“他们”则共同织造并成为“我”难以割舍的源头印迹。

我仿佛看到一个神灵跳舞,扭动身体。/
另一神鼓点密集,驱赶我身体里的魔障,我自己。/
我那腐朽的先人, / 无时无刻不在用他们的诚实,拖拽我的视线。/
它们闪烁着,如切如磋,如我母亲 / 柔弱的一生。如今,我却要出卖它们,换取 // 旷野里的一丝微光。^[12]

在诗人着意构建的意象体系与感受图式中,旷野上的豆地、稻田、高粱全都“在痛苦中生长”,而万物的自然生长以及祖辈们像春耕秋收一般的生育繁衍,无须思考“方向”甚至已然丧失掉反思时代与省视自身的能力。但“我”所祈盼的成长是挣脱观念的牢笼,在泥渍、漆黑、撞击中不断向前,“我想成为它们”——群山与楼群、与整个星球的撞击,藉此勘破“生生不息”背后隐藏的生命要义。“80后”诗歌通过对汉语语言和个体生存的困窘展开持续的辨识,以期抵达某种精神向度上的自我觉识,重新激活和拓展母语自身的语言质感与诗性言说的能力。汉语特质及其语言潜能的问题内核显然无法盲目地寄托于汉语自身的优越性或现代性,重审汉语性范畴或可突破以古今、中西或新旧之别来理解汉语诗歌书写传统的惯性思维。

二 主体性的辨识

“80后”诗人通过诗歌来处理驳杂的时代社会经验,首先亟待解决的是对诗歌或书写自身这一行为的反思,也即诗歌是什么或曰什么是真正的写作(书写)。我们在认识当下的时代与社会这一过程中,既面对着消费语境以及由质疑和消解而带来知识经验的碎片化、离散化,同时不得不追问时代究竟需要的是怎样一种写者的姿态,德里达意义上“大写的诗人”与“大写的书”甚至成为某种超越宗教的指向。因为喷涌而来的知识信息和私人经验的碎片化,与海子、戈麦、多多等人对原始旷野乡村的激情式抒写有所不同,“80后”诗歌想要透过现实事件和日常经验来进入一种更具历史性和普遍性的精神

领域则变得尤为艰难，对语言和存在之源头的回溯更多地被稀释为一种个体性感受，或仅局限为炮制一首诗歌的技术。“个体”成为姜涛所言的一种没有困境、没有难度的“常识性主体”^[13]，当我们从蜗居的城中村或地下室自觉地挤入地铁、再一齐涌向十字街头璀璨斑斓的幸福生活时，“怀乡病”的疼痛感似乎已经悄然间得到自我痊愈，这必然加剧了当代汉语诗歌写作与精神操练的艰难程度。

从“80后”诗歌的创作实践来看，将写作视为一种与语言本体发生相互关系的同时，直接指涉的是对个体自身所处位置或生存状态的持续探询，不同层次地展开某种个人主体与历史主体的精神对话。厄土《状态》一诗写到，“远离人流涌动的漩涡，冷静得/如同深陷在陡峭河岸间的/一块石头”^[14]，每个人都在没有方向的风中生活——无根地飘荡而又旋转，而抒情主体“我”呈露的主体姿态是一个不怕风的人，“站在一片苦楝树的顶端”经受着无尽的欢笑与恸哭。“我”正如那只不知疲倦地拜访同一个空巢的鸟儿，执著地探询着个体存在的意义。另一首诗歌《记忆之诗》把个体的存在看作是“生活口中易忘的语词”，将旧时光比拟为“蓝天中鸣叫的黄雀”，却必然面对：

时间的箭矢/洞穿它们敞开的心胸//它们
血肉模糊、重重地下栽/可这中间——无休止
地/振翅、鸣叫、欢呼^[15]

厄土诗中飞鸟意象有着西西弗斯的义无反顾，以及岩石上的三叶虫、黑暗里的石头、面临野火和石块的草颚，在某种层面具备着一种类似的精神立场，正如《恰似一棵草》诗中清醒决绝的认识，“不存在，厄运的逃亡者/不存在求救的时刻”^[16]。因此，抒情主体选择“我独自行走”，并且拒绝所有外界所强加或赋予的意义，主体自身的生存选择始终是独自的，“而我/是独自的，独自的一切”^[17]。当前时代精神的贫瘠反映于诗人个体的困窘和焦灼，藉由诗歌展开的自我探询和反复叩问尽管无法获得终极意义上的答案，但“80后”诗歌相对呈现出一种开阔的视野和从容的气度，已然祛除年轻身体携带的暴戾之气，但或许客观上带来诗歌精神指向与批判力度的相对弱化。再来看两首同题诗歌《个人史》，须弥的诗歌凝炼为六行：

二十八岁，灵与肉/咬牙，切齿/躲起来/
反复画梦/他的国家在/玻璃弹珠、布娃娃和
猫之间^[18]

主体对“国家”的指认关乎对自身位置和身份的确证，诗歌的短小与内容的丰厚形成一种两相对峙的张力，灵与肉之间的矛盾与区隔所带来的是个体的愤慨和逃避，“躲起来”“反复画梦”既可以作为一种消极情势来理解，但同时也凸显出主体某种强烈的文化反抗姿态。“他”对国家的认知仍旧停留于幼年的知识经验，拘泥于游戏、玩偶、宠物之间而不能够呈现二十八岁应当具备的成长与成熟；或者说，“他”对于眼前现实与事实情境下的国家始终存在某种隔膜或失落，更愿意保留原初的美好而澄澈的本初印象。对比茱萸的诗歌《个人史》，先来看首节：

这个世界奇异的褶皱或者裂痕/深渊是幽
暗的所在，幽暗背面/幸福是否已经静静开始/
那些文字里的沧桑，什么人可以横渡^[19]

个人在面对语言与文字背后的宏阔历史时，在飘荡中勉力抗争的“乳牙”到底是敌不过那些历经霜冻的关节。诗歌内部经受着“败下阵来”的精神冲突，却积极转向一种内部的和解与坦然，尾句“请让我干净得一如那些早年的诗篇”与须弥的诗歌有着异曲同工的表达。茱萸的诗歌在主体的探询中融入一种二律背反的思辨性，如诗歌《风雪与远游》中，首先提出个体的存在无足轻重，“你”从来不是风雪背后假想的敌人，指认这是一个无能为力的开始；但是，诗歌末句却重又阐明“为造物而生的机窍，在你我的掌心静泊”^[20]，经由语言和诗歌我们能够触摸到“残缺之上的完整”，接近或掌握万物生长的众妙之门。在场与抽身，溃败与可能，相逢与零落，断言与归谬，诗歌在围绕主体生存与汉语内部的理性辨识中获具一种精神超越的可能性。

茱萸的诗歌《仪式的焦唇》关注精神生存的缺口，“书写”本身即裹挟了所有的痕迹、风暴、欲望，以及所有无意义的虚无和贫乏；但或许，这恰恰给予了诗歌言说其存在的合理性。“说出，便等于自圆满处打开缺口。/宿命的嗓子如何习得这样的腔调，/又如何暖在暖晴的暮色中，调转微醺的镜头？如何看，如何省略和舍弃，如何学会/打碎自己”^[21]。诗人从世博会的鲜亮与明媚中首先省思

的是个体观看的视线与诗歌语言的表达,面对横亘于眼前的世界缩影,“如何看”其实导向了一种主体身份的自我觉察。“不仅我们所观看的事物受到我们自身文化的制约,甚至我们的观看方式也必然受到我们所知和所信之物的影响”^[22],由此人们(数十万人)被惯性裹挟着练习排队、依次安检、佯装沉思,甚至使用同一种类似的腔调与均匀的呼吸。诗歌以冲突并置的方式来凸显个体内心的焦灼体验,虚胖与瘦削、单衣与盛典、圆满和遗憾等,所有“观看”的典型事件在诗人这里成为一种朴素而真实的生存境遇。在个体寻找“观看之意义”的过程中起初呈露出一种消解或变动的不确定性,通过主体的内省而重新获得意义的确立,但源自语言内部的合法性危机却如雷暴的暂歇无法获得究解。

无论是诗歌创作还是批评读解,我们对自身的“观看之道”始终保持着足够的自信甚至带有一种“不可逆转的意见陈述”^[23]或话语的威权,因此持续的反思尤为必要。在“80后”诗歌创作实践中,相对普遍地存在一种词与物之间隐喻关联的游移,甚至呈现出抽离事件与生活本身的倾向性。如果完全抛却上海世博会现场这一线索提示,再来重读《仪式的焦唇》中“作为可折叠的肉身”“啞哑的灯盏和流水的逃亡”“明亮的胁迫和仪式的干渴”^[24]等类似表达,较为容易陷入一种解诗学的迷局。熊焱的诗歌《指甲刀》创造性地选取了作为爱情信物的指甲刀作为切口,“我害怕只是那么轻轻一下,这把小小的指甲刀/就会剪碎了我疲惫的相思和体内的暗疾”^[25],指甲刀“锋利的刃”与爱情苦痛之间的勾连方式稍嫌单一,不利于营构自足的诗歌结构。杨庆祥的诗歌《我躲进茨维塔耶娃的身体里入睡》,因为吃了不洁食品而止不住地呕吐,“我”的目光随之转向茨维塔耶娃,“今天晚上我就在她身体里/呕吐、失眠、入睡/直到慢慢复原”^[26]。语言疗救或精神危机的背后隐匿着时代的深层病因,像一首诗歌无法说出他的全部,濒危的个体以及某种普遍性的困境与焦虑亟待被真正言说出来。语词的象征漂移与主体的自我疏离相应而生,我们似乎过于信任和青睐那种悬浮的隐喻涵义与私我的情绪节奏,忽视对实感经验与感受图式的细节化处理。主体的辨认同样是语词的辨认,需要

诗歌文本在歧异和思辨之外注意凝炼某些具体而微的、可以触摸的细节,继而提供一种有迹可循的明暗线索,以丰富的细节来剖分、呈露个体内部幽微而独特的生命体验,越过浅表或肉身而指向一代人反复咀嚼和辨认的书写难题。

三 可能性的语言

诗歌语言的试验以及诗歌精神的历险,使得“80后”诗歌“纸上的还乡”成为一种可能,这种可能性始终依赖于语言自身言说能力的重新激活,藉由诗性的言说触及那些不可能的事物或被遮蔽的声音。在乔治·斯坦纳看来,那些沉默与无言恰恰是一首诗歌无法说出的全部,书写的魅力恰恰在于呈现或揭示诗性言说本身的复杂性与丰富性,而这与汉语自身的创造性潜能具有深层的联系。张枣有谈论:“为我们点亮世界的母语是我们生存的源泉。但母语在给我们足够活下去的光亮的同时,也给了我们作为人的最危险本质——我们对我们自身的觉悟。”^[27]当我们醉心于拨弄汉语语言奇异而繁复的言说技巧时,不得不面对一种必然到来的语言活力的消褪与流失;随着记忆的消逝与经验的离散,汉语对于揭示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言“人身上的人”以及激活和拓展语言自身言说能力的实践仍嫌不够充分,当前时代精神文化的隐疾呼吁着“80后”诗歌作出更为有力的探溯和回应。

现代化进程、历史意识、政治话语、审美趋向、语言特质等内容共同制约着现代汉语诗歌“可能性”问题的思辨逻辑,张枣、臧棣、姜涛、余旸等人对“可能性”问题的阐发有着内在差异,汉语诗歌语言的内在分歧仍然持续性地给予“80后”诗歌充分的紧张与压力。正如余旸的论析,“由于‘传统’内在于现代化历史进程的阐释过程中,而文化政治话语所提供的焦虑与压力,也转变为诗歌创造力的动力机制,恰好为重新解释‘伟大的传统’提供了一种崭新的可能”^[28],当代汉语诗歌面对时代语境和书写自身的焦虑,亟需省视与更新“80后”诗歌当前固有的观看方式和语言观念,呼唤那种真正触及同时代人生存经验的书写差异和语言创造。“80后”诗歌的语言试验和结构探索在不

同的面向获得长足的进展，唐不遇的诗歌《第一祈祷词》仅有6行：

世界上有无数的祈祷词，都不如/我四岁女儿的祈祷词，/那么无私，善良，/她跪下，对那在烟雾缭绕中/微闭着双眼的观世音说：/菩萨，祝你身体健康。^[29]

诗歌以简练的文字刻画四岁女儿的日常与瞬间，汉语的质地与情感的朴素相得益彰，朴实无华的技艺反而凸显出语言自身细腻而丰富的言说能力。作为神灵的菩萨与“祝你身体健康”的祈祷词，形成一种精神对话过程中远与近的映照，重新发现人身上的神性。在郑小琼的诗歌《树木：黄斛村的记忆》中，村庄的命运与个体的生存密切联系在一起，对往事的回忆同时是对主体自身的检视与叩问。“苍凉的庄稼地/活着歉收与潦倒的命运，它们冷漠，迷茫/不动声色地活着，风吹拂着树木骨头内部的情义”^[30]，树木的扎根和生长正如个体的生活悲剧一般顺次上演，经受着落日的锋刃而同时向天空投射着无尽的悲悯。树木见证着村庄与一代代人的爱与死。树木的坚定与静默，以及抒情主体“我”在失语中浑噩消磨，“忍受着比哑巴更深的痛”——我将自己站成从不开口的树，使人更悲哀的是普遍意义上失语的日子和孤独的人们，重复并亲历着“树木”一样的命运：

雨水斑驳墙壁，日子的幻象来于树木的绿血/他们在二十年前种下自己的棺木，杉树林里/乡亲砍伐着，把自己钉在树间，土里^[31]

诗歌从树的遮蔽、个体的遮蔽衍生而至时代生活的遮蔽，藉由可能性的语言展开辨认以期获得对生活幻象的某种觉识。洛盎《沐浴在县城》一诗同样呈现出针对日常幻象的比拟，被情欲反锁着、梦被盗窃、被捆绑的蝴蝶等类似表达直陈处境的艰难，将搭乘县际公车的学生们笨拙不安的旅程与等待施洗、接受净化的“人们”建立起密切而奇异的勾连，“沐浴”因此具备特殊的意味。“被言语的轮滑鞋催促着，被学生簌簌发/抖的手提袋平衡着，幸免于梨子的棒喝”^[32]，作为修辞者的“我”始终心怀忧戚，沿途的风景无异于精神的历险。由乡村抵近城市的路程被喻为一次“沐浴”，携带着清澈的承诺和美好的愿景，而我却还是宁愿靠近“归

程”；“80后”诗歌的语言试验集中呈现一种知识化、散射式的逻辑进路，凸显语言的陌生化与结构的自足性。与洛盎的写作类似，部分“80后”诗歌在隐微书写的层面论及沐浴、净化、施洗、怀孕、畏敬、承受，其指向问题矛盾的准心不免飘忽、游移，遗憾地减褪了其精神向度的自我意识和穿透力度。

“80后”诗歌一定范围内享有足够的“写作特权”，诗歌语言的试验不乏呈露出某种极端的走向，肆意挥霍语言的权柄而必然带来诗意的溃散。有如袁永苹的诗歌《一寸照片》写20岁的放浪，“跪下哀求一个肮脏的陪酒女能留下来”^[33]，李浩的诗歌《在诗里》对个体的强调，“我摸着淮河的裙子/我征服水”^[34]，黯黯的诗歌《表妹》对两性的揶揄，“如果你愿意，那些云的状态和雨的补语也一并传授给你”^[35]，张二棍的诗歌《山中慢》描摹老人的耕作，“他们一个夏天，都锄啊锄/我总觉得，他们忙于自取其辱/他们已经无所谓了”^[36]，春树的诗歌《等待一个神谕的启示》营设争议的语境，“那架冲向世贸大厦的飞机/上的恐怖分子/当时想了什么”^[37]，语言的无节制被误解为一种口语的狂欢与戏谑，“还原生活的百无聊赖又生机勃勃的一面”^[38]等类似的诗学评价，难以从汉语语言与现实生存的深层联系上厘清或撬动当前人们的固有认知。当代汉语诗歌应当对语言的质地以及诗性伦理、诗歌正义秉持一种足够的真诚，自觉地与浮泛散漫、躁动激愤的肆意言说保持界限，“我们往往漫不经心地忽视或助长了语言的暴力，以及语言背后那颗杀伐果决、摧毁一切的野心”^[39]；这类缺乏知识与技艺豢养的诗歌语言试验难以获得真正的信度，无法彰显真正的书写以及语言的抱负——涉及“汉语的良知、汉语的道德、汉语的洞察力、汉语的表现力”^[40]并作出积极的回应。

一个诗人的写作方式往往取决于其对语言自身的判断与觉识，同时代诗人藉由诗歌语言的试验“意图在诗歌与当地社会、文化间建立起积极的对话关系”^[41]，以汉语自身的语言质地或抒情方式赅续诗性言说的内在传统。知识的荟聚与技艺的精湛正以反向的方式呈露当前时代汉语诗歌和语言

自身的贫瘠，语言的原初光晕又能够多大限度地照亮个体或时代的生存，纸上的还乡亟待一种可能性的、足以激活自身潜能的语言。

四 代际性的潜望

丁成在《“80后”诗歌档案：一代人的墓志铭和冲锋哨》的编后记中说：“真正的一代人的精神特质、写作风貌、历史个性已经真实地摆在了时间的八角台上，赞成也罢反对也罢，‘80后’既存事实，存在了便是最好的证词。”^[42]而从时代的精神需要和写作的内生规律来看，我们显然并不满足停留于此种基本意义上的事实梳理。才华横溢的诗人与技艺精湛的诗歌在当前的时代并不稀缺，西川在“中国80后诗系”序言中说，我们真正匮乏的是诗歌价值层面上“有意义的诗人”，“一向被夸张的失败感还在，但深入失败的人少了。诗人们之间玩着‘暧昧’，可以将‘暧昧’玩到疯狂，但不是一条道走到黑的那种疯狂。诗人们的创造力还在，但不约而同地有点小资了”^[43]，时代经验与消费语境带来的碎片式、快餐化浸染着每一个生存主体，我们的注意力像是被裹挟一般始终紧盯着诗人的标签与靓丽的语屑，不同程度地弱化或曲解了那些独属于汉语语言自身的品格，在时代滑腻的软风与枕上精致的温梦里对那些耽溺于小情绪的分行文字一笑而过。与此同时，“80后”诗人的语言试验和创作实践无疑是对这类诗学问题及诗歌压力的直接回应，肖水在《被拖入田野的双重景象》一诗写到：

马匹皆深入镜中，熟悉的材料是 / 折损的
青草与蹄印，它们 / 像一些短诗的诱因， / 间
或，会有衔着树枝的小鸟 / 干净地落下^[44]

在词语与物象建立的关联背后潜隐存在着作为抒情主体的诗人形象，并以此为依据而提供一种观看的具体路径：熟悉的、折损的、干净的、打滑的、颠倒的、散开的，甚至连观看视域里的荷花也是“复杂和邪恶”的，整首诗歌的言述逻辑与抒情主体的个人意志紧密联结在一起。田野物象的存在或曰“被梦见”，穿梭游移于虚构和真实之间的语言质料，它们一方面被自身的实存而照亮，另一方面又为诗人或诗歌的意识经验所激活，以此确证诗人

及诗歌写作本身的意义。也正如戈麦的自述，“在词与词的交汇、融合、分解、对抗的创造中，犀利夺目的语言之光必将照亮人的生存”^[45]，通过诗歌和语言真正触及同时代人的生存与命运的隐秘，使不可能的成为可能。也如肖水在诗歌《松枝》中谈论故土及个体的生存，“活着更像难以补足的重复”^[46]，《写诗》一诗中那根用于写作的铅笔，具备着麦秸的精神姿态却被从中间折断，诗歌《返乡》的末句更明晰地指称“写作到达不了故乡”^[47]；与此同时，我们却更加敏锐地意识到文字与诗歌背后隐秘的激情或野心，主体的遮蔽与写作的困厄已然从另一维度印证了纸上还乡的可能与精神辨识的朝向。

“80后”诗人对生活的体察有着其私人化、多样性的感受图式与历史想象力，切身参与或应对着信息语言的风暴与诗歌书写难度之间内生性的张力，个体生存的困窘与语言书写的焦虑带给“80后”诗人双重的写作参照。我们既感喟于日常生活渐已消褪了语言自身神性的“灵晕”，又枯视着眼前仿如“麦秸”一般孱弱的笔杆，以及字里行间过多戏谑调笑的声音抑或是故作严肃深沉的面孔；“80后”诗人的“写者姿态”在无物可写与无能为力的两极不安地游曳，间或发泄一两声愤懑或不满。这恰到好处的愤懑与不满已然给予我们足够安全的空间，同时应当庆幸：诗歌与写作自身即赋予了我们一种反思与批判的能力，不会轻易迷失语言还乡的朝向。王东东的诗歌《生活研究》中，围绕抒情主体“我”和“他”之间的争辩、屈服、蔑视等内在的思想冲突，转而成为一种自我鞭策和精神刺激的有效动力，“我要学习那白色的鸽子 / 丢掉手中滚烫的尺子？去生活 / 在生活的对立面”^[48]，继而真正触及生活的本质与内核，而这是否意味着必须摒弃我们个人的评判标准与价值尺度。主体性的探询与诗性言说的抵达注定了诗歌必当作为一条远路而存在，王东东在诗歌《纯诗》中写到，“枝条荣枯不同，更贴近本心 / 以此看待随口说出的语言”^[49]，另一首诗歌《诗》直言诗歌的产生来自于“不安”，“我要为我松散的新诗辩护？ / 所谓自由，就是 / 与一朵云同寝，被其无故压伤”^[50]，而这必然罹患却又难以治愈的疾病和疼痛恰恰凸显出

写作自身的难度。再来看胡桑的诗歌：

失败者逐渐削弱自我，无形的经验开始 / 获得寂静的根系。蓄满的愤怒终于稀薄；（《命名》）
它们干燥，安静，命运从枝头滴落下来， / 见证了那么多溃散；（《禁止入内》）
日复一日，你制造轻易的形式， / 抵抗混乱，使生活有了寂静的形状；（《赋形者》）
杯中的牛奶，又一次安静， / 桌上的橘子顺从了天气。（《词语》）^[51]

抒情主体的观看方式以及诗歌语言的言述趋向，巧妙地指向与“寂静”或“安静”紧密联结的对立面，如失败和愤怒、混乱和溃散等精神状态，诗人应对处理此类冲突和矛盾的方式具有某种一致性，即通过个体内部与精神向度上的自我觉识而抵达一种澄澈、稀释、和解，以此尝试从漫长的旅行、言辞的疾苦、突如其来的暴风雪中突出重围的各种“可能性”，执著坚定且充满耐性地展开自我挖掘与探询，“我只能通过敏感的舌头搜寻道路”（《词语》）^[52]。再如戴潍娜《海明威之吻》一诗中“唇，被灌食了刮了鳞的词句”，诗歌《表妹》中“我愿你认清字中的荡妇与烈女 / 还有那些被时代碾过的词句”，以及《写小说的人》诗中“那就盖一间草堂 / 娶一群姿色摇曳的词”^[53]，抒情主体对时代的审视与其对书写者个体身份的探问融汇在一起，为什么书写以及如何书写成为引发“80后”诗人集体性关注的命题。如果以此返观戴潍娜的诗歌《横身的教堂》《塑料做的大海》等，“危险”“瑕疵”“幻象”成为诗歌所要试图辨别的关乎书写自身的品质，而这种风险成为时代整体性的知识经验无法逃避的一种困厄，诗歌的出路、语言的还乡与当代人的精神生存由此建立密切的联系。语言作为澄明而又晦蔽的到来，书写者主体的无法去蔽与语言自身的无法去蔽，必然导致语言召唤能力的消失殆尽，难以照亮个体与时代而使存在者敞亮。“80后”诗歌乃至现代汉语诗歌的衍进应当指涉一种知识技艺的更新和思想言说的自由，在此文化意义而非时间概念上的“代际”则切近于诗性言说质朴真诚的底色，更加抵近语言作为存在之寓所的原初想象。

知识与技艺的背后，“80后”诗歌迫切应对和

集中处理的仍是语言和诗歌自身的内部问题，一种指向“原初语言或诗意语言”^[54]的写作才是海德格尔所说专属于存在、走向澄明之境的语言，由此或许能够为讨论“80后”诗歌的当代性与历史文化问题提供敞开的语境。我们不无苛刻地论及“技艺崇拜”或价值的缺失，同时客观上注意到“80后”诗歌在书写历史与时代经验的深度、广度层面的积极尝试和拓展，以汉语性和现代性为两翼来构建汉语诗歌“共时体”^[55]，“80后”诗歌以其特殊的观看方式见证着当代社会正在变动中的历史，努力发掘汉语诗性言说的语言潜能。“80后”或许意味着某些激昂、夸妄、躁动、迷惘，但作为“同时代人”的他们渐渐成为另一种意义上的“我们”，正如胡桑在《我们》一诗的结尾所说，“我开始水一样流淌 / 世界变得简单、稀薄而透明 / 就像一些让我激动的文字 / 我们是其中紧挨着的两个逗号”^[56]，“我们”共同参与且感受着“80后”诗歌还乡路途上的暂歇与停顿，切实经历又反复咀嚼着“80后”诗歌所有的欢欣与蔽塞，“我们”期待着更为复杂而丰富的诗意、一种更具可能性的语言，并以此传递出我们自己“对这一时代的特殊环境的感受”^[57]，使一代人或一首诗能够说出他的全部。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现代汉语诗歌用典的原理与结构研究”（22CZW054）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1] 刘波：《“第三代”诗歌研究》，第289页，河北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2] 孙周兴：《我们时代的思想姿态》，第190页，东方出版社2011年版。

[3] [11] 海德格尔：《荷尔德林诗的阐释》，孙周兴译，第31页，第183页，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

[4] 于坚：《还乡的可能性》，第209页，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

[5] 张执浩：《神的家里全是人》，第9页，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7年版。

[6] [40] 臧棣：《犀利的汉语之光——论戈麦及其诗歌精神》，见戈麦《彗星》，西渡编，第252页，第255页，漓江出版社1993年版。

[7] 余曷：《“九十年代诗歌”的内在分歧：以功能建构为视

角》，第49页，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

[8]张枣：《环保的同情，诗歌的赞美》，见《张枣随笔选》，颜炼军编，第22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版。

[9]辛西：《辛西全集·旅途中的月光：诗歌卷》，第84页，长江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

[10]刘化童：《往世书：2005—2013诗歌自选集》，第8页，长江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

[12]徐萧：《白云工厂》，见《复旦十九人诗》，肖水编，第84页，北岳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

[13]姜涛：《拉杂印象：“十年的变速器”之朽坏？》，见《中国诗歌评论：细察诗歌的层次与坡度》，肖开愚、臧棣、张曙光编，第85页，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

[14][15][16][17]厄土：《舌形如火：2003—2013诗歌自选集》，第31页，第82页，第57页，第104页，长江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

[18]须弥：《鸟坐禅与鸟居摆：2007—2013诗歌自选集》，第70页，长江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

[19][20][21][24]茱萸：《仪式的焦唇：2004—2013诗歌自选集》，第81页，第66页，第146页，第146—151页，长江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

[22]周宪：《视觉文化的转向》，第7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23]约翰·伯格：《观看之道》，戴行钺译，第33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25]熊焱：《更不敢玩好》，见《80后诗歌档案》，丁成编，第164页，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26]杨庆祥：《我选择哭泣和爱你》，第205页，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

[27]张枣：《诗人与母语》，见《张枣随笔选》，颜炼军编，第54页。

[28]余曷：《“可能性”诗学及其限度——“九十年代诗歌”现象再讨论》，《文艺争鸣》2017年第9期。

[29]唐不遇：《第一祈祷词》，见《汉诗·十年灯》，张执浩编，第267—268页，长江文艺出版社2017年版。

[30][31]郑小琼：《郑小琼诗选》，第146—147页，第148页，花城出版社2008年版。

[32]洛鑫：《沐浴在县城》，第29页，阳光出版社2012年版。

[33]袁永苹：《一寸照片》，见《诗建设·24》，泉子编，第299页，作家出版社2016年版。

[34]李浩：《你和我》，第37页，武汉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

[35]黯黯：《痛苦哲学：1998—2013诗歌自选集》，第159页，长江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

[36]张二棍：《山中慢》，见《汉诗·十年灯》，张执浩编，第336页。

[37]春树：《春树的诗》，第236页，重庆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38]许泽平：《80后诗歌研究》，硕士学位论文，第89页，广西师范学院文学院，2012年。

[39]周俊锋：《汉语特性：80后诗歌声音书写及阐释路径的省视》，《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6期。

[41]冷霜：《当代文学中的“日常生活”》，《分叉的想象》，第41页，光明日报出版社2015年版。

[42]丁成：《“80后”诗歌档案》编后》，见《70后80后诗歌档案》，刘春、丁成编，第252页，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43]西川：《所谋或许更大更远——“中国80后诗系”总序》，《失物认领》（肖水著）“序言”，第3页，阳光出版社2012年版。

[44][46][47]肖水：《失物认领》，第125—126页，第177页，第150页。

[45]戈麦：《关于诗歌》，《戈麦诗全编》，西渡编，第426页，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版。

[48][49][50]王东东：《云》，第74页，第173页，第9页，阳光出版社2014年版。

[51][52][56]胡桑：《赋形者：2001—2013诗歌自选集》，第14页、第48页、第49页、第65页，第65页，第87页，长江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

[53]戴潍娜、杨庆祥、严彬：《所有未来的倒影：戴潍娜、杨庆祥、严彬三人诗选》，第5页、第19页、第40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

[54]王一川：《语言乌托邦——20世纪西方语言论美学探究》，第101页，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55]张桃洲：《构建汉语诗歌“共时体”？》，《中国当代诗歌简史：1968—2003》，第171页，中国青年出版社2018年版。

[57]穆旦：《致郭保卫》，《穆旦诗文集·增订版》第2卷，李方编，第22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版。

[作者单位：西南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

责任编辑：罗雅琳